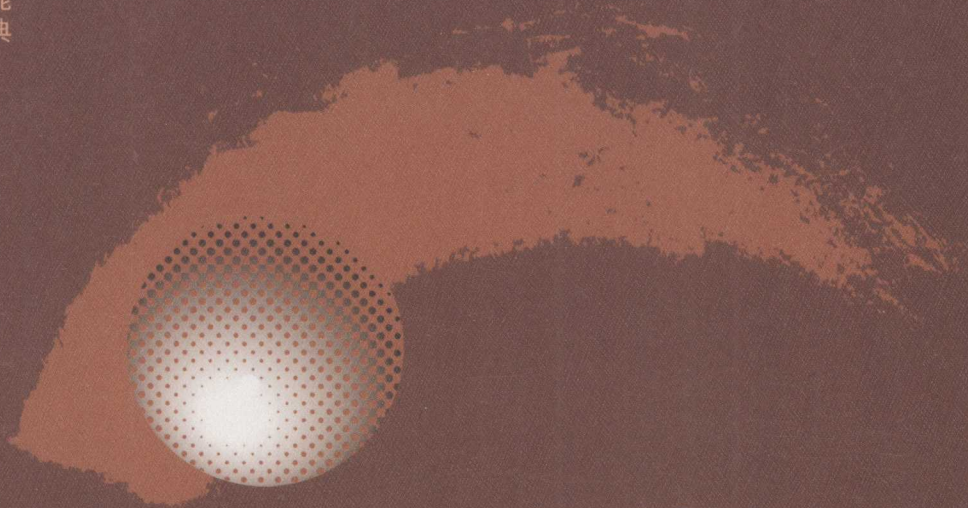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芃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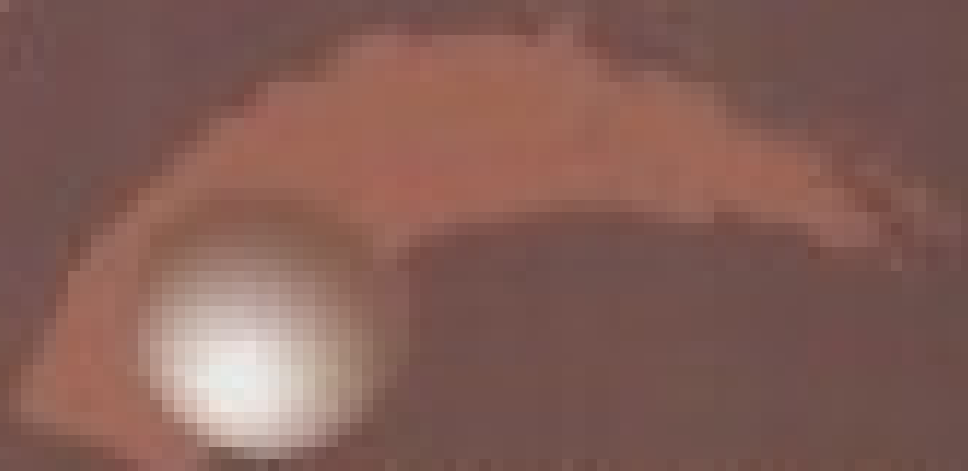
跨文化的争论： 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

[德] 约恩·吕森 主编
陈恒 张志平等 译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山东大学出版社

THE
EYE
OF
THE
EAST



跨文化的争论

东西方文化论战与历史反思

作者：[美] 爱德华·泰勒
译者：王康、李强

THE EYE OF THE EAST
THE EAST AND THE WEST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芃
主编

跨文化的争论： 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德)吕森主编;陈恒等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

(新史学沙龙/陈启能等主编)

书名原文: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

ISBN 978-7-5607-3824-6

I. 跨...

II. ①吕... ②陈...

III. 史学史:思想史—西方国家—文集

IV. K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109 号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720×1010 毫米(1/16)

印 张:13.25

字 数:251 千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八十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第一位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

的，是必须要有一份对中国史学存续承继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应是人们进行相关思考的起码的心理基础或共识。

我们发现，能同时体现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说没有，而是太过其少。对于巨变中的史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新史学沙龙”出焉。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2008年4月

目 录

导 论

- 作为跨文化话语的历史思想 [德]约恩·吕森(1)

第一部分 论题

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

- 十个命题 [英]彼得·伯克(15)

第二部分 评论

一、一般评论

- 透析历史人类学 [德]克劳斯·墨勒(35)

探求共同的史学原则

- 关于伊斯兰传统的辩护及评论 [巴勒斯坦]塔利夫·卡利迪(57)

二、西方的特性

- 论历史思想的古代史 [法]弗朗索瓦·阿尔托(63)

创伤与苦难

- 一个被遗忘的西方历史意识根源 ... [荷兰]弗兰克·安克史密特(70)

- 西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史学思想 [挪威]约翰·伽尔唐(83)

与中国史学相比,对于西方史学的西方特性

- 是什么?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100)

- 世界历史的西方化 [美]海登·怀特(110)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

三、他者的观察

- 从阿拉伯人的视角看西方历史思考
..... [叙利亚]萨迪克·阿尔—艾泽姆(118)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日]佐藤正幸(126)
西方独特吗?
——从非洲视角得出的一些不同看法
..... [肯尼亚]戈弗雷·默里乌基(139)
历史纲要
——一个西方视角 [马里]马马杜·迪尔瓦拉(145)

四、他者的差异

- 中国史学思想反思 [美]余英时(149)
历史必须遵循理性的解释模式吗?
——来自中国人视角的批评问题 [美]托马斯·李(169)
关于早期印度历史思想的几点反思 [印度]罗密拉·塔帕尔(173)

第三部分 编后记

- 回应 [英]彼得·伯克(185)
作者简介 (195)

导 论

——作为跨文化话语的历史思想

[德]约恩·吕森

为什么历史思想必定成为跨文化的

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功能：它们形成认同感。它们把自己的活动领域划定了界限——它们自己生活熟悉的、令人安慰的一面——与别的世界相区别，这个世界通常是一个“他者世界”(other world)，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以世俗的观点来看，历史记忆与历史思想履行了这种确定认同的功能；因为人类及其世界的世俗变化——人们的经验常识所带来的结果与人们曾期待的或计划的并不一样——这危害了自我(self)对自己所属世界的认同与熟悉。这种变化要求精神上努力保持世界与自我的熟悉，或者——在变化极端混乱的感受中——重新获得这种认识。

认同开始于起源与未来之间。这一过程不能是置之不理的自然之链上的事件，而必须是智力上的理解与获得。这种成就的产生——是靠历史意识——通过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在现实的语境中回忆往昔而获得的。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制造意识(creating sense)的过程。^① 这个过程把昔日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期待融合为当代进程中的综合想象。这一

^① See Klaus E. Müller and Jörn Rüsen, eds.,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Zeitkonzepte, Wahrnehmungshorizonte, Darstellungsstrategien*, Reinbeck, 1997.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

当代概念铸造了人类生活世界,向自我(这一概念的主语是“我”和“我们”)提供了连续性与一贯性,提供了内在的一致性,在主题变化的期间内以防本质核心或相似想象的丧失。根据生活局限性的现实,以及自我精神状况局限在事与人范畴之内的状况,自我场所有一个时间的维度。仅仅通过这种时间维度,自我场所就固定在群体和个人文化环境中了。在自我定位的过程中,自我会在普通世界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对他者或他性(otherness)划出界限,也就是在这里,他们彼此相遇,并区分出彼此,从而凸显自我。

这类界限被规范地决定着,并总有负荷价值(value-laden)。在那种特定的综合经验下,这种经验决定着一个有历史意识地知道一切并渴望指导自己的那些人的行动和目的,这种经验可以清楚地阐述为记忆经验,同时又是有意识的目的(intended goal);它是事实与规范(fact and norm)、贷方与借方,但又几乎是难以区别的。这对于区别自我与他者、相同与相异是特别重要的。为了生存于自己的世界,拥有自我的本质,就要很快地发现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由固定的观点、价值和规范的偏好决定的。负面的、危险的、不安的方面遭到积压并被排斥到“他者”方面,这些东西在这里是处于边缘的,是要遭到摧毁的。这就是历史记忆的部分功能,也是历史思想有意接近往昔的部分功能,而把任何往昔当作是属于自我的时间与自己的世界秩序,并且使自己的自我理解合法化,从属于一种固定的评价;因此通常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与世界、自我相关的经由时间积累而来之经验负面效果就消失于自我世界、消失于自我的内在空间;它们被排斥到边缘,并刻意保持那种距离。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认同(identity-building)的差异一直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起着作用,记忆的任何努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规范关系(normative relation)。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尽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伴随人类认同(human identity)而来的。

自我与他者之间、相同与相异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使得历史记忆处于矛盾之中,并易于产生冲突。就像对自我群体认同的强调会为其成员认同,而处于这一群体之外的人则拒绝,这一圈外的人在这些时间场景(time-tableaus)中表现并不自在,更不用说让他们赞成了。这种不对称的方式与程度变化很大;其一般的特征是紧张的状态,即它们一直处于一种彼此矛盾的战斗(bellum omnia contra omnes)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在构成自我中彼此排斥。当然,各个部分共同关心的一点是防止这种紧张状态的爆发。因此,它们寻求和发展内在的——和跨文化的交流方式来驯服、开化甚至克服种



族优越感的不对称。

“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是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的一种特殊方式。历史意识扎根于历史记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历史记忆,但是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与历史记忆存在差别。“历史意识”的特性在于瞬间洞察(temporal perspective),在这一瞬间,往日与现在相联系——通过现在——联想到未来,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法来构思的。特别是,“历史意识”的现代形式则把现实中的往日尽量清除,因此赋予现实的是另一种事物的面貌。这样做并不是说往昔对现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而是作为把历史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归结于往昔的手段。历史关系是由往昔与现在暂时的紧张状态决定的,是由往昔与现在本质上的差异决定的,是由时间进程中出现的往昔与现在的辩证关系、议论与叙述而决定的。

记忆至关重要的力量在于可以让往昔一直生动地存在下来,那些记着往昔的人可以一直真实地感受这些往昔。当精神的程序返回到往昔时,而这种返回是超越生理寿命的,往昔就成为历史,就会遇到不同时代的人们。因此,历史思想的未来展望也就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平均寿命从而进入未来后代的生命之中。从而,无数的经验丰富了与往昔的历史关系。仅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特殊的历史记忆赋予历史经验的重要性的意义,才会进入视野和评估。这也改变了往昔经验宝库中有意义使用的方法。这些据为己有的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它们可以使用范围广泛的叙述策略。不管怎样,在历史认同形成方面所制造意识的一般类型仍旧是相同的:因为往昔一直被解释性地转换为历史,“存在的自我”(being self)和“存在的他者”(being other)仍旧严重分离,并被作为对立物进行评价。

即使“历史意识”的解释业绩以历史研究的学术形式得以表达,历史认同的规范因素之传统力量还仍旧盛行。即使是在方法论上属于对照研究(controlled research)的历史学也是由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决定的,是由历史研究的观众的期待和喜好决定的。学术上的历史研究被归属于历史文化,而在历史文化中,自我与他者又被分别对待,并以一种固有的眼光来进行评价。因此,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问题仍旧存在,假如从属形式之间存在差异,差异之间存在差异,又如何解决这些差异呢(一般来说,这些差异决定并社会化组织人类生活)?怎样能让那些产生种族优越感的相互冲突的场域平静下来并得以克服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是千差万别的:从学术上看,历史研究有责任加强其对往昔的解释性转换的主观有效性,把这种有效性加强为归属与差异的历史构建。在这里,“主观”有效性也包括他者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

像自己群体中的成员一样认可的原则。然而，这类一致并不废除属性的各自形式之间的差异，也不废除在各自的历史影响下的那些特别的认同性。恰恰相反，差异与认同是由往昔的魅力所清楚表明和铸造的。因此，学术上对真理的申辩最终取决于那些方式，在方法论上属于对照研究的框架内用这些方式“产生意识”时是可以调控的。

今天，对于此类调节的寻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当今，不仅仅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内所存在历史差异处于危险之中，就像，比如在历史学领域会以民族观点和欧洲历史职业标准的趣味来衡量。到如今，移民过程和全球化过程已经产生了一大堆新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欧洲各个国家、民族、社会发现自身遇到了来自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置疑和挑战。这些非欧洲文化批评西方的文化霸权，急切地想把西方强加给他们的历史解释摆脱去。西方历史思想必须反思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批评，这种批评坚持认为在普世有效性要求的背后，在理性标准的背后存在对权力和垄断的要求，这些要求如果不是毁灭其他文化的主权的话，也会危害到其他文化的主权。这种不同观点的冲突已经在历史思想的西方解释内部引起了自我批评的习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已建立的历史文化的方法和制度已经找到了协调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关系的新方法，或者说就彼此之间文化差异达成了协议。在西方社会内部，其自身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他们不仅不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当作不同，而且明确地将其定义为罕见的、奇怪的。这种少数的他者怎样能在多数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个位置呢？

历史应当怎样成为跨文化方向的资源？

（不仅）欧洲历史思想有两个传统，这其中存在一个可能克服种族主义优越感的观点被淹没了。其中的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历史解释的古老模式，这一模式是由西塞罗的话语“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铸造的。从分类的角度来看，这可以描述为制造意识（*creating sense*）的楷模。这样一种历史思想方法可以把往昔经验的空间大大扩展并超越历史学家自身文化的范畴。因此，这种方法也拓展了以往把焦点关注在特定文化背景之历史观的视野。这种记忆模式把往昔当作巨大的经验库，从中可以得出人类行为举止的一般规则，这种经验品质被归结于一般人类世界的往昔，不管会从中得出什么样的价值与应用，这些东西在对当前进



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肯定时或许都是有用的。然而,在解释过程中,往昔就会变为利己主义的附属品。制造意识的这一模式拓宽了历史视野,也拓宽了归纳历史判断的可能性。因此——至少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从客观的立场来看,把往昔不同的因素组合起来适合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对称的两分法。因此,对他者的理解变得更加易受实际经验影响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摆脱狭隘的种族优越主义。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于开放心灵举止原则之上的经验加强了活动与定位的能力,但是这并没有打破那种归属与差异规范模式的力量。

18 世纪的“启蒙”及其带来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拓宽了全球观的历史视野。同时,人类变为普世形式了,认同特性的构建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解释、构建、解构,从而获得知识的合理性(intellectual plausibility)。这种经验的、规范的普世性为历史思想打开了新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不知名的那些他者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①大体上来说,这种普世观点打破了自我局限性的观点以至能用来反思他者。

在人类这一概念范畴内,历史思想获得了新的批评可能性,历史思想自身从特殊利益和权力主张的局限性中得以解脱。然而,这些利益和政治权力主张同时承担使普世合法化的权力,它们自身也获得了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力量,这种力量掩盖着尊崇自我、贬低自身不熟悉的事物这一程序。这种不能适应特殊环境的自负淹没在“现代性精神”之中,而现代性精神则毁灭了那些从属于这种精神的自负。

“历史主义”反对对人类制造意识这一概念进行普遍化,沿着这一普遍化,通过加强个人原则、加强分歧与特性的一般合法性而不断达到进步的终极目的。兰克的著名言辞是:“每一个时代都立即与上帝发生联系,其价值根本不在于会依靠上帝从中得到什么,而是上帝的这种存在代表这自身的存在。”^②这一说法表达了历史哲学的范式。在这种情况下,认同感的建立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自我特性不是被当作唯一合适的普遍化,而是也必须理解作为其他特性的不同之处。

然而,甚至在这种历史主义者的范式下,判断与他者的关系仍旧是不稳

①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1736~1766 年出版的 66 卷本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该书 1744 年起被翻译为德语。

② Leopold von Ranke,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Aus Werk und Nachlaß*, vol. 2, eds., Theodor Schieder and Helmut Berding, München, 1971, 59f.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

定的。当各个民族、国家、文化的不同历史主题为权力和霸权争斗时，已经证明对那些有着特殊性的事物给予特别尊重的“上帝”是一言不发的。从长远来看，这个上帝继续是各个自我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他者可能被叫做“陌生者”，因此就进化而言，他者被边缘化了；它们退化到仅仅是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代表，或者说它们被推到历史领域的边缘，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它们自始至终属于那个领域。以中国为代表的在历史主义的通史和世界史是一个特别富有启示的例子。^①

当历史观念超越了历史主义领域而发展到以解释世界的全球观点和自我理解的全球观点时，这不能否认他们欧洲中心主义起源，也不能否认他们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和概念，即使他们认为在思考这个领域，迄今也认为这个领域是天赋的、永恒的。欧洲和西方仍旧是全部事情的标准，即使历史比较是在社会科学方法基础上以更加精确、更加全球的观点时也是如此。

当历史和历史思想本身成为主题时，历史概念中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变得特别明显。他者或许只是在验证人类的差异性时才被看作具有历史意义和解释意义，然而这一切是鉴于“研究过去”的方法，如果作为特殊的“历史的”方法通常已经——毫无疑问地——由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决定。即使是当今那些主题或标题为“史学”的著作，事实上只研究西方—欧洲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这还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② 偶然出现的一些认为在我们自身传统^③以外还有重要史学传统的评论并不能动摇把欧洲的优势当作本质存在的说法，因为这些他者的传统只有在西方研究者要揭示欧洲历史思想的轨迹或相似的一面而又不妨碍西方人的观点时才被承认。事实上，我们从这些观点中所能学到的是(除了概括特殊的趋势和把它转变为本质的趋势以外)使“我们的”历史处于特殊的第一位置。^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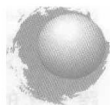
这并不是说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真正笼罩着史学史或者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事实上，历史主义已经加强了历史差异的感觉，结果在解释学的帮助下，我们关于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知识已大大增加了。特别是历史教学

① See Andreas Pigulla, *China in der deutschen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96.

② Christian Simon, *Historiographie.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 1996.

③ Rüdiger vom Bruch and Rainer A. Müller, eds., *Historikerlexikon. Vo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1.

④ 比如 Donald E. Brown 的 *Hierarchy, History and Human Nature, The Social Origin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uscon, 1988. 该书价值就在于在严格的欧洲历史思想范式基础上对历史意识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



法传播了解释和表现的多元策略,并加强了这些说法,至少在部分教科书中是如此。^① 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方法已为历史思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研究方法。然而在研究非欧洲历史或者在研究全球史问题和主题时,多元观点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关注非欧洲史学思想的方法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也不会导致对一般设想的批判性反思,这种一般设想就是在这种比较研究中被真正当作历史思想的观点。

当然,研究者自身历史思想中那假定的元史学作用(Metahistorical Role)^②并没有引起注意。至少,后现代主义对各种现代化模式之无条件应用和意识形态上使用的批判已经动摇了以往完全自信的解释腔调,而这类腔调是那些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在宣称他们的解释模式是主观际性(intersubjectively)时常见的——这就是说他们的解释对不同的文化差异是有效的。然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涤荡,这种批判把历史理性中的认识有效性这一不成熟的想法抛弃了。结果是认识论上的文化主义、政治上的文化主义,这就把融入各种暂时性的、地区性的文化特性的洞见局限于不同文化的内在本质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这已变得依靠这些文化自我理解的眼界。这类解释除带来巨大的认识论上的、解释学上的问题外,还带来下述问题,即当以另外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看待他者,从而自由了他者的价值和自负时,会引起下一代的不满。他们发现这会迫使自身与解放了他者的自身文化发生联系,结果真正认识到他者。这种文化主义把文化上的差异转

① See Jörn Rüsen, "Das ideale Schulbuch. Überlegungen und Leitmedium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in id., *Historisches Lernen. Grundlagen und Paradigmen*, Köln, 1994, pp. 156-170.

② "Metahistory"一词系怀特根据"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一词杜撰而来,也有人将该词译为"玄史学",明显含有贬义。鉴于该书对学术界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故译为"元史学"为好,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美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元史学》(1973)、《借喻现实主义:对模仿效果的研究》(1999)、《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文集》(1990)、《希腊罗马传统: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和历史表现》等。《元史学》全名为"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年初版,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再版。怀特的《元史学》在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学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批评者中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伊格尔斯了。早在1997年赫尔辛基一次学术会议上,伊格尔斯就对怀特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后来这篇文章连同怀特的回应文章一起刊登在美国《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 2000年第4卷第3期)杂志"争鸣"栏目中,使人们不得不再次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可参见John Rüsen、Pieter Duvenage编辑出版的《元史学研究》(*Studies in Metahistory*, 1999)。

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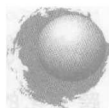
变为解释上的单子论(monadology)，从根本上阻碍了文化间的交流或者以很高的代价使可接受的规则成为可能。

首先的尝试——问题和结果

因此，历史思想并没有准备好解决这些由国际间的和跨国际间所引起的问题。在一个已经预测到的“文明冲突”的背景下^①，结果是引起了新的交流，在这种新的背景交流下，所涉及的各种主题或许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文明彼此之间是怎样或为什么是不同的，自然也就建立了一种紧张的感情。这样的相互理解是必需的，至少从减少甚至是克服冲突的角度而言是这样。这些冲突的目的是为了认同，达到自我理解，自我本身最核心部分的理解。因此，历史是联结和积极解决认同问题的必要中介，从而也不能不牵涉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根植于当代文化方向的每一个问题。这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机构或因现代社会而形成的一个文化机构，产生了作为讨论、表现和实践的基本知识，在这类活动中认同、从属、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与他者的界限则引起了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是怎样产生的，这也是文化能力如何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并列为后代提供跨文化交流方法的目的问题吗？这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一问题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简单的信息满足、理解方面的要求，到在研究、教学、公众表达方面重新评估自身文化工作的基础和习惯。当今不断增加的非西方专家加入将是极其重要的。尽管这些非西方学者自身努力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由历史造成的当代价值不对称的情形，是为了认识他者的自我理解——这个问题只能由直接交流的实践来回答。只有当他者和我们自己互相同意时，只有我们以历史的观点与他们联系时，文化方向的客观性任务才能由主观的方式解决，反之亦然。在历史的自我现实基础上，自我与他者的相互一致意见已经取得了成就。（当然，这不能被当作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的工作，而仅仅是开端、正在进行的过程。这些不断重复的经验源自日常生活，源于对权力的争夺，源于利益冲突，源于我们自身行为所带来的无意效果，源于他者对此作出的反应，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Der Kampf der Kulture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Die Neugestaltung der Weltpolitik im 21.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6.



这需要不断努力理解自身的历史位置,理解他者的自我理解。)

收于该书的论文所表达的就是这种目的:这些论文不仅要探讨从自身历史思想的角度来看待他者的原因,而且讨论、分析在与它们交往的历史文化的精神空间的共同基础和差异性。以欧洲历史思想的传统作为这种尝试研究的开端并不令人惊异,因为直到现在为止这一一直垄断着国际话语。然而决定这种范式的方法——人类历史地叙述与世界的、与自身的关系——这种传统不再被当作必然的了。但是那些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的话语并非是这样情况,而更多的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文化策略的批判已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这类策略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将会持续下去。真正把西方当作特殊的是——甚至在其相反的定义和概念中——已成为公开的问题。

该书中相关的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即使用最简单的、最清晰的方法也不能捕捉到西方历史思想的特殊性。这一观点在本书中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反映^①——这不应归咎于书的编排形式,因为书的内容是独立于书的编排形式的。那种认为不同文化的本体论之固定“本质”的观点不再扮演有意义的角色了。因此,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来看,斯宾格勒的文化差异的单子论(monadology)已失去了争辩的权力(这种理论是否失去了对政治的控制权力是另外一个问题。由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所引起的狂热让大众传媒身陷其中,这也让人难以有个果断的回答)。

鉴于这点,彼得·伯克(Peter Burke)发出了这种论调:“西方”不仅是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自我解释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形成历史感的各种因素的混合物,这其中的每一种因素在别的各个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此外,关于彼得·伯克的西方历史思想的十个典型特征说法的争执正确地指出,即使是这种并列关系也易遭受分解和调整。然而,我们在非西方的评论那里发现了一种不断重复的与众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仅仅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间接表达;在这里,对西方霸权所作出的抵抗正不断加强。这种抵抗或许有不同的形式,并列历史思想是同样有效地,甚或是西方模式比较好的替代方

① 我注意到,在这本书里的作者仅仅有一位女性的声音。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会议期间——该书就是在这次会议基础上形成的——有许多女性学者参加了会议,许多女性学者应遵从性别角度的简洁发言,这对于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意外情况,本书最终几乎没有对这些女性学者作出反应。不过,大概与下述事实也有一些关系:作为文化研究中次要系统的女性主义话语越来越僵化了,自身越来越脱离了其他学术讨论。